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朱东润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041

041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郜元宝 编 | 朱东润 卷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41, 朱东润卷/徐俊西主编;

郜元宝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762-6

I. ①海… II. ①徐…②郜…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张居正 (1525~1582)-传记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797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胡远行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41

朱东润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郜元宝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5 字数 284,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62-6/K·301 定价: 40.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序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底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叙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底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民国二十八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叙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叙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底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底著作;在传叙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底人格论读到莫洛亚底传叙综论。当然,我底能力有限,所在地底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底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中国传叙文学之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叙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

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叙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叙。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底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底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叙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底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乃至最进步的著作,如朱子张魏公行状,黄榦朱子行状底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叙文学底进展。我们对于古人底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底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叙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那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底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底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底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底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底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底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底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

作,打开“现代传叙文学”,底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底生平。我们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看到她底保姆,看到她底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底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底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现代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底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证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不朽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底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底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饥带讽,似小说不似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始终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子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今日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

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纷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叙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传叙文学,也许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底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底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叙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叙文学底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底传叙,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三十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底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

了解。有的人底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底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底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人类共同的弱点。传主底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底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底阴影下面,对于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底选择,增加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底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看到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走到崩溃,中国由安定走到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叙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著作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探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

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叙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我国人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今代,乃至不知和今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现在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传叙文学底通例。一个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西方传叙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

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牒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诚直解一卷。除女诚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牒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诚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牒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底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底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牒底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牒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系的书牒；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

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牒诸篇底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牒,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书牒凡例敬题)嗣修认为书牒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书牒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岷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歿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牒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牒而论,所谓“编年”,真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册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底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底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底空虚。我感觉徬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叙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叙文学底写成,不完全是材料底问题,同时还有写法底问题。蒙尼辨耐底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底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底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底传叙,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底

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叙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众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底语汇太贫乏了，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叙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很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

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人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驂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叙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叙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叙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叙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阶徐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鬻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